

武则天传

她是唯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的美貌、智慧、狡诈、狠毒、领导艺术、领袖魅力、卓越的洞见力等，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千百年来争议不休。她的历史功过，犹如那块『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WUZE TIAN

武则天传奇性和争议性的一生

本书全面、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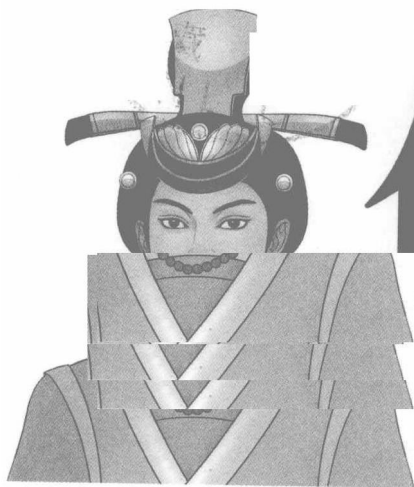
何国松◎主编



◎ 吉林大学出版社

武则天传

WU ZE TIAN



何国松◎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则天传/何国松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01-5109-0

I. ①武… II. ①何… III. ①武则天(624~705)—
传记 IV. ①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5059 号

书 名: 武则天传
作 者: 何国松
责 任 编 辑: 王世林
责 任 校 对: 王世林
封 面 设 计: 创品牌
出 版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5109-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武则天的一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帝。她的美貌、智慧、狡诈、狠毒、领导艺术、领袖魅力、卓越的洞见力，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千百年来不休。她是怎么样从唐太宗的才人变成唐高宗的皇后的？她为什么要突破人伦的底线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女？她怎么能够在一个千百年来都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成为一代女皇？她的大周王朝如日中天，怎么又会及身而止，不传之后世？她推翻了李唐王朝建立了武周王朝，为什么李唐的子孙又始终对她尊奉有加，把她当作自己的皇帝？一千三百年来，她的一生是历史也是传奇，她的历史功过，犹如那块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本书以武则天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一生为主线，全面、详细地描述了武则天的成长过程、婚姻关系、家庭角色、行事模式、掌权经历，以及治国方略等，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当然，本书并非一本历史学著作，因此，我们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文和读者的需要，合理、大胆地进行了合乎文学规律的再创作和艺术加工，以期给读者带来最大的精神享受和阅读享受。

由于学识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不当之处自是难免，诚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先予以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多难的童年	(1)
第二章 入宫为妃	(24)
第三章 剃度落发感恩寺	(48)
第四章 入主中宫	(72)
第五章 封赐武氏族人	(98)
第六章 并称二圣	(104)
第七章 泰山封禅	(112)
第八章 整饬外戚	(121)
第九章 辅政有方	(130)
第十章 接班人问题	(166)
第十一章 威权独任	(195)
第十二章 登上皇帝宝座	(261)
第十三章 驾驭天下之术	(292)
第十四章 风烛残年	(319)
第十五章 大周帝国的终结	(333)
第十六章 女皇升天之迷	(344)

第一章 多难的童年

则天皇帝（624~705），名武曌（音同照，武则天专为自己名字造的字），她晚年的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死后谥曰“大圣则天皇后”。唐玄宗时追谥“则天皇后”，因此后人称之为“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也是中国古代最具争议的女性。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举用贤才，取得了无数令人称道的历史功绩。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正月二十三，武则天出生在都城长安。她的父亲武士彠庶族出身，曾追随唐高祖李渊起兵，是唐朝的新贵族；母亲杨氏出身世族，门第显赫，家里世代都有达官，而且是隋皇室的亲戚。

武士彠民间传说他是一个经营林业的木材商人；不过《攀龙台碑》却说他出生时就有帝王之像，文武兼备，人格如何高，学识如何优，才干如何好，这么多优点令他名震当朝，隋文帝屡加辟召，司徒杨雄、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宏、兵部尚书柳述等公卿大臣，争相向他抗礼求教。李峤奉旨写《攀龙台碑》之时已经是大周王朝的时代，此碑是女皇为颂扬其父武士彠——这时已追尊为“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后来唐朝史臣撰改国史之时，怀疑它和旧史有“过为褒词”和“虚美”之嫌，不足以深究，不免对武士彠的事迹大加删除，以至也有过为删削之嫌。



其实，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们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据史书的记载，南、北朝以降，高门子弟穷哈哈或无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时期的武士彠，经营木材很可能就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书说他“家富于材，颇好交结”。近世有些学者据此推论武士彠以鬻卖木材为业，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屡兴巨大土木工程，所以致富，因此判断他是投机善贾之流。经商致富之说，大抵可信。不过，投机是善贾之能事，好交结应酬也是商场的惯例，根据士彠的发迹事迹看，他的确是能观时通变之人，这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使他能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

武士彠经商致富与隋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一事建设有关，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营建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修建东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设，遂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分别担任营建的正、副使——杨达后来即是武曌的外祖父。大约武曌之父武士彠贩卖木材进入东京，利用关系与财富，常与权贵交结，一时轰动当朝。其间，他曾招致杨素的猜忌，想构以祸端，幸亏他经商的优点适时发挥作用，因为交结广、神通大，得到杨雄、牛宏等权贵的营护而免于祸，从此深自隐匿，以求自保。无独有偶，后来女皇的情夫张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们的权力贩卖木材及其他买卖，为时人所侧目与批评，给女皇带来了危机。

杨素向来负冒财货，营求产业，在东、西二京和诸方都会处，置有物业以千百数，素为时议所鄙。武士彠因为经商应酬而得罪了杨素，应有可能。总之，武士彠曾经得罪杨素而逃隐，极可能是一个事实，因为女皇革命之后，曾下旨禁锢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不准他们担任京官和侍卫，或许与此事有关。

武士彠逃隐后开始注意局势的变化，及至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对高丽用兵失败后，国内乱局开始扩大，反隋起义逐渐蜂起。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下，武士彠遂想到要出山，决定往事功方面发展。不论他的真正动机究竟如何，这时炀帝实施广募骁勇、扫地为兵的政策，武士彠参与隋军，

可见他是有志从军立功，以求仕宦的。

武士彠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资历，出山后当上了鹰扬府队正。队正统率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长官。《攀龙台碑》对武士彠在隋末的军事表现着墨极重，用以表彰其父亲的军功，目的是透过颂扬先人的积德累功，作为武周早有天命的论述根据，遂使此碑所述有过为褒词和虚美伪冒之事。碑志在中国素来是用以谀美死人的，只要不过分相信，也就无伤大雅。

鹰扬府队正只是一个小军官，而太原留守李渊则系出陇西李氏，是今上（隋炀帝）的表弟，身份官爵均高，武士彠怎样结交上他，以致成为唐朝开国功臣？

根据《攀龙台碑》的说法，士彠要出山时，诸兄耳闻李密——当时反隋群雄之最有实力者——之名，乃劝他前去投奔。“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士彠告诉他们。显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头，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图功业”。恰逢此时（大业十一年，615），李渊奉诏往山西讨捕起事人民，安抚地方。他行军于汾、晋之间，休止于士彠之家，因蒙士彠招待，乃得以结交。至十三年（617），李渊奉诏坐镇太原为留守，于是引用士彠为行军司铠，成为留守府主管军事装备的幕僚。因此后来攻入长安，他就顺理成章地官拜库部郎，掌控全国的武器军备设施。

士彠虽为留守李渊所引用，却是副留守王威之党，不是李渊的心膂之托。武士彠观察李渊，认为此人“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于是攀附不遗余力；李渊也常往武宅“乐饮经宿，恩情逾重”。长官与部属之间有信任和默契，有游乐和享受，应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与李渊两人身份地位悬殊，结交也没多少时间，关系却如此快速的发展，应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结果，因此后来李渊对武士彠说，“尝礼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这时的李渊，对武士彠来说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货，全心投资以期日后获得巨大的报酬。反之，李渊一方面因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



又鉴于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经营专才以协助处理军事装备，所以也就引用士彧为行军司铠。事实上，李渊在太原广结豪杰，历史记载当乡长的晋阳（即太原）富人刘世龙就曾因人引见于他，李渊“虽知其细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于武士彧原非李渊的心膂之托，所以李渊没有让他参与起兵及进攻关中的任何重大决策。不过，武士彧对大唐的“太原起义”却有很大的贡献。

大业十三年，李渊鉴于群雄争霸之局已成，隋室终不可挽救，于是也想策马参与逐鹿。犹豫之间，一时不能遽定。武士彧某晚夜行，听到空中“有称唐公（李渊）为天子者”；又梦到“从高祖（李渊）乘马登天，俱以手扞日月”，于是列状告诉李渊。这事虽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当时，无异是劝李渊起义，能够增强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欢，益以自负”。另外又呈献所写兵书给李渊，等于教李渊用兵作战。李渊请他幸勿多言，许以将来成功之后，“当同富贵耳”。

此外，当李渊秘密进行起兵部署时，武士彧还有以下两件功绩。

第一件是当李渊以另一起事集团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为借口，下旨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集结之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对此怀疑，尤其因长孙顺德、刘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审判。武士彧劝告两位副留守，说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审判他们则必与唐公大起纷争，使王威等不敢行动。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议王威等审按募兵的状况，士彧又劝止他说：“讨捕兵马的兵权总隶于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过仅是寄主罢了，他们又能怎样？”所以田德平也中止了行动。这两件事的摆平，使李渊能顺利进行募兵和集结，寻即举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逮斩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将军府，任士彧为铠曹参军。接着随军攻取关中，期间以功拜寿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从平京师，迁光禄大夫，赐宅一区于长安。同年十一月，李渊扶立隋恭帝

后，又录前后功效改封为义原郡开国公，增邑一千户。第二年——隋恭帝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炀帝死讯传来，李渊废恭帝自立，开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后来的唐高祖。武士彠不久之后被任为库部郎，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衔。至武德三年更迁拜工部尚书，跻身“当世勋贵”之列。不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兑现“当同富贵”的诺言之外，为了感谢当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两兄为郡公，声言“欲使卿一门三公”云云。

唐朝史臣说武士彠“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也就是说他只是因为从龙首义，故依照惯例封为功臣而已，这评价就武士彠以上所说的表现来说，显然甚不公平。纵使不论武士彠在李渊起兵前夕所立的功绩，单从他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确名列于少数幕僚的名单中，一直为李渊管理和供应军备之事来看，显然也是极为称职的，因此也就不能说他当时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军备后勤的有效策划和支持，李渊的部队能如此顺利攻进关中吗？中国人论战一向着重战场表现，“戡难之劳”指的是指挥镇定的统帅和冲锋陷阵的将士，后勤支持常遭忽视，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视前锋攻进一样，不知有效的后勤支持，也常是取胜的关键。武士彠胜任铠曹参军之职，可以从李渊平定京师后，即任用他为兵部库部郎一职看得出来，三年后升迁他为工部尚书，应当也与借重此才干有关。就是说李渊一直借重武士彠的经营管理长才，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开国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从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担任工部尚书，中间曾因参与令典的编修，因此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唐初常例上常用武人为都督、刺史，是则位为尚书、曾任军将的武士彠，外放为都督而出掌方面，应该是早晚的事。

隋末占有淮南地区的是杜伏威、辅公柘集团，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请降入朝，所部由辅公柘统率。公柘于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行军元帅，李靖为副，率领李勣等七总管往讨，至第二



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为东南行台左仆射，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其年行台废，孝恭转为扬州大都督，李靖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丹阳连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平定之，吴、楚以安。不过，寻因突厥入侵，李靖于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旨率军北上抵抗，空缺由武士彟接任。士彟在八月以后以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官衔，赴任接替李靖。所谓“权检校”即是暂时代理的意思，《攀龙台碑》说皇帝约武士彟“期以半年”，即是如此。不料士彟此去，就再也没有回任中央的机会了。

武士彟的留任扬州，和他在任上的成绩有关，碑文说他“降北海之渠，未逾期月；尽南山之盗，诟假旬时。然后商旅安行，农桑野次，化被三吴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区日渐安定、经济日渐恢复。因此，当武德九年半年约期届满之时，调返中央的不是武士彟而是李孝恭，扬州大都督则由襄邑郡王李神通接任。原因是因为有当地“父老数百人，诣阙上奏，乞更留一年”，所以玺书褒奖，让士彟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彟协助李神通迁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阳迁于江北，使广陵从此成为州治，得以专扬州之名，这亦武士彟的一种政绩。士彟的经营长才，也应由此作观察。

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将、尚书令、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逼其父皇交出政权。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执政期间，中枢高层换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马担任要职。所以此时征召武士彟入朝，对他仅是止于宠赐频繁，事以殊礼，以安慰父皇旧部罢了；不久却另以捍卫战略要地的理由，将他改授为豫州都督。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变逆父，改朝换代之际，秦府班底当道，这是他不能重任中央官的原因。不过，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机或战略之地，所以才有机会施展他的经营管理之才，大抵以维持社会治安为主，恢复经济为辅，政绩不错。依照唐朝章法：“大虑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补前过曰定，安民大虑约定，纯行不爽曰

定。”可见士彥因为历任都督，有安民之功，因此被有司建议谥为定。如果不因人废言，武士彥不失为一个干材。他的发迹虽然颇富传奇性，但是绝非仅因从龙首义而例封功臣，一个庸俗的马屁精而已。

贞观皇帝对于武士彥并无特殊的厚待，赠官不是最高级的三公官，也不列他人“凌烟阁功臣”名单之内。武士彥后来多次被追尊，武士彥与其女武曌被贞观皇帝之子后来的唐高宗宠爱有关，追赠并州都督是在武曌为昭仪之时，追赠司空、司徒·周国定公是在武曌为皇后之后。及至武后与高宗合称“二圣”，更被追奉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户，以文水县三百户充奉陵邑，置令、丞以下诸官，他的庙讳和祖先名讳皆严禁他人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以后，又追崇其父为魏王，食邑一万户。

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为忠孝太皇。革命后，于天授元年（690）尊为孝明高皇帝，庙号太祖，陵墓称为昊陵，圣历二年（699）改昊陵署为攀龙台，即是《攀龙台碑》的由来。

武曌生母应国夫人杨氏，名讳或许是“真”或“贞”，是武士彥的继室。

武士彥的原配是相里氏——可能是汾阳地区门第不高的胡人之后，为他生了四个儿子。武德三年以后，士彥统领并钺军，官拜工部尚书，跻身新贵，照顾一家从此可以同享富贵荣华；可惜天公不作美，两儿相继病死，士彥的心情自是悲痛。当他们病重之时，武士彥因为军职在身，无暇照料，甚至连前往探问也没有，仍然勉力从公，没有声张。

一年之后，相里氏也因病亡故，中年丧偶，武士彥的心情更是悲恸万分。由于武士彥这时的爵位是义原郡开国公，故相里氏的身份即是外命妇，她的死讯不得不奏报朝廷。听了所司启奏，武德皇帝深受感动，下敕褒扬说：“此人忠节有余，上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

相里氏死后，士彥带着两个儿子元庆、元爽鰥居。士彥在京有宅，前



后有不少封赐，兄弟及宗人在京做官者也常有来往，原本也不为生活发愁。但是，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南、北的社会文化明显出现了差异：原来从商鞅改革以来，秦汉流行小家庭制度，晋朝以降汉人避难渡江，故南方保留了此风习，仍然以小家庭居多，即使聚族而居也是各自异炊，妇女极少步出闺庭，交际往来也少，在家以管中馈为主；北方则相反，北方因为民族之间长期互相征战，汉族是被征服者，所以他们常是聚族谋生和自卫，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盛，文水武氏就是其中之例。所以，北方的社会风俗专以主妇持门户，家庭里主妇的地位极为重要，她们争讼曲直，造请奉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人事多由内政，社会生活相当活跃。南朝一个名人颜之推来到北方，就惊讶于这种差异，认为是受到鲜卑遗风的影响，将之写在他的著作《颜氏家训》里。如今武士彟丧失主妇，对他的家庭乃至家族事务，就因失去重心而产生不便。武德皇帝对这位功臣的状况极为关注。

武士彟这时正以工部尚书参与撰改令典。此时国家所修的令典应当是《武德律》和《武德令》，《令》的部分于武德七年（624）三月先定，至四月《律》、《令》全部完成，遂将此《武德律令》——唐朝第一部法典正式向全国颁布。所谓《律》，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法律，《令》则是政府组织法。唐朝后来所订的《律令》，皆以此为因袭的源头。唐朝《律令》属大陆法系，对东亚的大唐文化圈极有影响。这是唐朝首次的重大修撰工程，依例，重大修撰之后定有晋爵或物质等赏赐，故武士彟得以晋爵为应国公。士彟可能仅参修《令》的部分，所以他的晋爵最晚不致于四月。这时，武德皇帝为他物色了一个婚姻对象——高门大族宏农杨氏之女。

杨氏在革命之后被追奉为“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女皇之侄武三思，奉制写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又称为《望风台碑》。此碑说杨氏是宏农仙掌人，及是周朝唐叔虞之后。垂拱元年（685），为忌仍为太后的女皇祖（武华）讳，将当时名为华州的宏农郡改为太州，又改太州的华

阴县为仙掌县，亦即杨氏实是华阴县人。

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一个门第社会，高门大姓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源和政治优势。当时全国的最大世族共有：因避晋朝战乱而渡过长江称为“侨姓”的，以（琅琊）王、谢、袁、萧四姓为最大；原籍在江南称为“吴姓”的，则以朱、张、顾、陆四姓为最大。在北方，汉人高门都称为“郡姓”，山东以（太原）王、崔、卢、李、郑五姓为最大，关中则以韦、裴、柳、薛、杨、杜六姓为最大。至于源出代北鲜卑集团的大姓都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七姓为最大。不论怎样，宏农杨氏是关中六大郡姓之一，门第之高连唐朝王室陇西李氏也不能比。

宏农杨氏由汉朝就兴起，至南、北朝末出现了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即隋文帝。女皇之母杨氏，和杨隋王室同宗不同房，她系出宏农杨氏观王房。所谓观王房，是指隋朝“四贵”之一的司徒·雍州牧·观王杨雄一房而言。杨雄是当时正炙热的权贵，其弟杨达也接连上任尚书、纳言（侍中），并曾以营东都副监官职和尚书令杨素主持洛阳宫阙的建设，封为遂宁公。杨氏即是杨达的女儿。杨雄和杨达兄弟两人贵为隋朝宰相，降于唐朝，杨雄之子杨恭仁是武德皇帝的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则是贞观皇帝的宰相，他们的侄子杨执柔也因女皇有“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之意而拜相，一个外孙女——就是后来参与封禅大典而行终献礼的越国太妃燕氏——则是贞观皇帝的妃子，家世十分显赫。

此时是门第社会，故武德皇帝即曾以开国集团门第之高贵为荣，认为他的开国集团皆系出高门世族，比汉朝开国集团的出身卑微越很多。在门第观念如此浓重的时代，婚姻讲求门当户对，若非“卖婚”，文水武氏如何攀得上宏农杨氏这桩婚姻？因此有人认为武士彟当年以贩卖木材之故，所以有机会认识负责营建工程及东京建设的杨达。及至达死隋亡，而士彟变成唐朝新贵，遂娶杨达之女为妻。此说仅是猜测之词。因为武士彟是否曾与杨达认识，无证可考；而根据《攀龙台碑》和《望风台碑》，武士彟



与杨氏的结婚，事在士彧进封应国公之后，且由武德皇帝亲自撮合。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士彧先缺中阍，武德皇帝亲为这位功臣搭线，知道杨氏尚待字闺中，于是就告诉士彧说：“隋纳言·遂宁公杨达，才为英杰，地则膏腴，今有女贤明，可以辅德，秦晋之匹不能加也！”于是特降纶言，俾成婚对。武德皇帝并且亲自为士彧的主婚人，另遣桂阳公主做女家的婚主，礼聘所需，均由官方供给。婚礼完毕，马上依班列拜杨氏为应国夫人。桂阳公主是武德皇帝之女，也是杨氏堂兄弟杨师道之妻。所以，他们的婚姻决非山东衰落门第的买卖婚姻。士彧也因这桩婚姻的缘故，与李唐王室或多或少也沾上了一些亲戚关系。

士彧原本家富于财，如果《攀龙台碑》所述是真的，则他做客以来前后赏赐甚多，封寿阳县开国公时食邑一千户，改封义原郡开国公时增邑一千户，武德元年又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别食实封五百户，进封应国公时又加实封八百户，从平京师时曾赐宅一区，表示在长安有住宅，即使后来外放为都督，回京禀报政情时，也不必像其他朝集使般“赁房与商人杂居”。也就是说，武士彧除了门第条件之外，财富和功名这两条件均十分优秀，所以皇帝才为他主婚，相里氏来不及享受的从一品夫人和荣华富贵，现在皆由杨氏来坐享。后来相里氏所遗二子对此后母不礼，这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根据《攀龙台碑》，说武士彧死于贞观九年（635），享年五十九岁。以此推算，士彧生于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德新律令修成时（624）是四十八岁。至于杨氏，根据《望风台碑》说死于咸亨元年（670）八月二月，春秋九十有二。由此推算，她生于北周宣政二年（579），比士彧小两岁，等到士彧四十八岁为应国公后，与她结婚之时，她已经四十六岁。唐朝女性一般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结婚，而以十五岁最多，是则杨氏嫁给士彧之时，早已过了适婚年龄。为什么会发生情况？

根据《望风台碑》的说法，杨氏出身高贵，对女红并不重视，而却明诗习礼、阅史披图，颇能属文，其父杨达许为“隆家之女”。或许因为她

的门第过高，或佛教信仰，而又教育良好的关系，故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及至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杨雄、杨达先后死于远征高丽的途中，此时她已经三十四岁。碑文说她哀于父丧，希望凭托佛教，“永奉严亲，长栖雅志”，表示已索性不愿婚嫁，祈福父灵。若不是皇帝撮合，杨氏恐怕即如此度过一生，历史上遂也就没有武则天其人其事了。

两人婚后生活情况良好，杨氏显然是贤内助，甚至武士彟的仕宦顺畅，也与杨氏“实资阴助”有关。贞观九年武士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遗嘱归葬文水，家人乃将他送回故乡安葬。都督是三品职事官，唐朝旧制：三品官丧礼均给卤簿，墓前树立一定高度的碑碣及一定数目的石人石兽，而由鸿胪丞监护丧事。武士彟由于是归葬，故宫造灵輴送至故乡，坟墓则因山而建，穿足容棺，殓以时服，丧费由官方提供。丧礼举行时，委由本州大都督李世绩监护，朝廷另遣郎中一人驰驿前去吊祭。依丧事的规格看，表示武家虽然富有，但依然十分节约。

杨氏先后为士彟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后来嫁给越王府功曹贺兰安石，季女嫁给郭孝慎，武曌则是次女。及至士彟死，杨氏时年五十七岁，悲痛欲绝，再度“方祈净业，敬托良缘。凭慧炬于幽途，舫慈舟于觉海。于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愿长伴夫墓；但是“特以圣上（武则天）年居膝下，爱切掌中；理藉劬劳，方资顾复”，所以才打消主意。根据《望风台碑》此说法，杨氏是因为武曌尚小，需要母亲的照顾，所以才转变凭托佛教、长伴夫墓的念头。此年武曌已十一岁。

及至永徽六年（655）武曌正位六宫，其年十一月杨氏被册为正一品的代国夫人，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死时赠鲁国太夫人，谥曰忠烈，寻又下制赠太原郡王妃。武后临朝，追奉为魏王妃，改其咸阳园陵寝曰顺义陵。革命前期追尊为忠孝太后，革命后又追尊为孝明高皇后，陵曰顺陵。后来又添“无上”二字，改顺陵曰望风台，故其碑又称为《望风台碑》。



那么，武则天的出生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武德七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古老的长安城人烟稀少。此时，李渊的心腹故旧、官居工部尚书、位尊应国公的武士彠，府第里灯火通明，丫鬟们一个个屏着气息、迈着匆匆步履来回穿梭忙碌着。年近五十的武士彠正在厅堂里踱来踱去，内室阵阵女人的呻吟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他有点焦躁不安。过了好久，他终于听到了“哇哇”的婴儿啼哭。

“生了，生了，恭喜大人，夫人生了位千金小姐。”一个丫鬟嚷着向尚书道喜。

“好好侍候夫人！”武士彠说话有些气喘，这毛病是当年在严寒的冬天随高祖征战的时候落下的。他嘱托了一声，忙趋进内室去看望夫人和新生儿。武士彠对小他两岁的后妻杨氏宠爱有加。

杨氏此时正疲惫地躺在床上，一见老爷进来，想支撑着坐起来。武士彠忙扶住夫人的肩膀，说：“快躺下，夫人身体虚弱，小心别冻着。”此时养娘早已把婴儿抱过来给老爷瞧。只见女儿大声啼哭，小脚丫使劲地蹬踢着，健康而有活力。

“夫人你看，这又高又直的鼻梁长得多像夫人啦。”武士彠乐呵呵的，老年得女，心中十分欢畅。杨氏没搭话，眼睛里却泛起两行眼泪。她对女儿的出世并不怎么高兴，她想生个儿子。武士彠有了四个子女。前妻相里氏生三子，幼子夭亡，元庆、元爽已长大成人。相里氏病亡后，武士彠由高祖李渊做媒并令桂阳公主主婚，娶前朝隋炀帝堂弟、曾任纳言的杨达之女为续弦。杨氏入武家后，生有一女，已四岁，即是后来被高宗所封的韩国夫人。由于武家族人轻视杨氏家道中落，丈夫前妻之子元庆、元爽不服管教，杨氏很期望给武家生个儿子，将来可以继承父爵，自己老了有个靠山。但命运偏与她作对，这一胎又生了一个女儿，因此不怎么欢喜。武士彠理解夫人的心情，劝慰一番，杨氏的心情好了一些。

武家的二女儿出生的这一天，长安城并没有出现一点奇征异兆，只是天